

张岱和陶诗辑佚与研究*

李剑锋

张岱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,其史料虽只言片语,亦是价值连城。今人夏咸淳点校的《张岱诗文集》据《张子诗钞》收录明亡后张岱和陶诗四题十二首,它们是:《和贫士七首(有序)》、《和述酒》、《和有会而作》和《和挽歌辞三首》。近日笔者发现除此之外张岱尚另有和陶诗二十八首。学者于此长期忽视,无人引及。故见之如宝,考察如下。

一、上图藏抄本《和陶集》

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张岱评东坡《和陶集》一册(以下简称“沪藏抄本”),不分卷,长27厘米,宽17厘米,棉纸,四周单边,半叶八行,行十八字。封面为牛皮纸装裱,首页空白,有二枚篆体方印:白文“芬客珍赏”^①、朱文“情禅”。卷前录苏辙《和陶集引》全文,题下依次排列六枚篆体印章:白文长方印“曜真云阁”、朱文长方印“上海图书馆藏”、朱文长方印“萝轩书画”、白文方印“白沙山樵”、朱文圆印“诗瘦”、白文方印“刘氏家珍”;正文卷端“《和陶集》”下注明“晋陶潜著、宋苏轼和、明张岱评”,右列首行下角自上至下钤三枚篆体方印:白文“睥睨九秋”、白文“鸣玉私印”、朱文“封山”;正文前半部分是陶渊明原诗及相应苏轼和陶诗;正文后半部分是陶渊明原诗及张岱相应和陶诗。张岱和陶诗部分首页有二枚篆体方印:白文“百岩私印”、朱文“孟度”;末页有二枚篆体印章:朱文长方印“鸣玉”、白文方印“西河刘氏”。

从藏印情况来看,该抄本应抄录于清乾隆以前。翁嵩年(1647-1728),字康怡,号萝轩,有“白沙山樵”印,钱塘(今杭州)人。康熙二十七年(1688)进士,著名画家、诗人。历官刑部郎中等,晚年退居西湖以诗酒书画自娱。卒年八

* 本文系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《辽金元陶渊明接受史》(批准号09BZW023)研究成果。

① “芬客”变形较大,曾请教刘心明先生,难以确定;以下“诗瘦”等印章识读也得到指教,特此致谢。

十二^①。刘鸣玉，字封山，清雍正、乾隆间浙江绍兴诸生。兼工诗画、书法、篆刻，为越中才子^②。现代导演钱英郁，曾名钱善根，笔名孟度。浙江省舟山人，1918年出生于上海，晚年曾居上海^③。不知印章中的“孟度”是否指他？如果依据印章，此抄本收藏基本经历这样一个历程：

翁嵩年（据“萝轩书画”、“白沙山樵”）→刘鸣玉（据“鸣玉”、“鸣玉私印”、“刘氏家珍”、“封山”，“睥睨九秋”或者也是刘鸣玉的印章）→芬客（据“芬客珍赏”，“情禅”或者也是“芬客”的印章）、百岩（据“百岩私印”）→钱善根（？据“孟度”）→上海图书馆。

《和陶集》正文为黑墨行楷精抄，有涂改处和朱笔圈点，天头红笔有行楷评语。最早提到张岱《和陶集》的是周作人，其《陶集小记》云：

《和陶集》不分卷，抄本一册，张岱评。书名和陶，而实则具录渊明原诗，附列东坡和作，其后有张宗子补和者二十五首，前半有张氏评语，其评宗子和作部分或出于王白岳辈之手乎？抄本在东坡和诗末尾有朱笔题记五行云：“张岱号蝶庵，所著小品如《西湖梦寻》，《越人三不朽》，已经梓行，其未梓者有《陶庵文集》，《石匱全书》，《夜行船》，《快园道古》数种。兹编予于会稽谢氏案头见之，丹墨犹新，盖其手自评点者也，较订陶集异同各字，视他本最善，因借抄一册，以为行笈秘玩云。戊子仲冬朔有三日，汉阳朱景超识。”

宗子和诗后又又有三行云：“右蝶庵和陶，如和‘规林阻风’及‘六月遇火’等作，中间涂抹不一，或注改字另入字，此盖其未必定稿也，姑仍之，以俟获正集时再订。虎亭识。”

案抄本中胤字缺笔，所署戊子当是乾隆之三十三年，去今亦已百七十五年矣。^④

张岱《四书遇》抄本中，有《寿王白岳八十》诗手稿二纸^⑤，又有《廉书小序》提到王白岳有《廉书》，周作人所推测的“王白岳辈”实际指张岱相识的友人。“沪藏抄本”中不见“东坡和诗末尾有朱笔题记五行”“朱景超识”，亦不见“三行”“虎亭识”和“戊子”字样。如果说后二者位置因处抄本之末可能是“沪藏抄本”残缺，而在张岱和诗之前、“东坡和诗末尾有朱笔题记五行”则一

①据清法式善《清秘述闻》卷一二和卷一四（嘉庆四年刻本）、葛金烺《爱日吟庐书画录》卷三（清宣统二年刻本）、冯金伯撰《国朝画识》卷七（清道光刻本）、阮元《两浙轩轺录》一〇（清嘉庆刻本）等。

②据清阮元《两浙轩轺录》卷一〇、陶元藻《全浙诗话》卷四九（清嘉庆元年刻本）、彭蕴璈《历代画史汇传》卷三五（清道光刻本）、《清诗纪事》等。

③钱宏主编：《中国越剧大典》，浙江文艺出版社、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48页。

④周作人：《知堂书话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848页。

⑤张岱：《四书遇》卷前附《寿王白岳八十》诗手稿前半影像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。

般不可能残缺,可见“沪藏抄本”当非周作人所见抄本。

值得注意的是,“沪藏抄本”书法精致工整而不失闲雅自然,前后基本整齐划一,几无殆情之笔,极为用心,似出一人之手;此抄本书法与张岱《寿王白岳八十》诗手稿二纸书法风格迥异,知非张岱本人所抄。所用纸张中缝皆有“嫫嫫福地”四字,张岱《嫫嫫文集》收录《嫫嫫福地记》一文,张岱《陶庵梦忆》收录《嫫嫫福地》一文,则此纸张很可能出自张岱家。故“沪藏抄本”若非“王白岳辈”所抄,则或出张岱子孙。

《和陶集》所录张岱和陶诗,计十六题二十八首^①。张岱和陶诗小引全文云:

子瞻喜彭泽诗,必欲和尽乃已,不知《荣木》等篇何以尚遗什分之二。今余山居无事,借题追和,已尽其数。子瞻云,古人无追和古人者,追和古人自子瞻始。乃今五百年后,又有追和古人者为之拾遗补阙,子瞻见之,得不掀髯一笑乎!

据此小引所云,知张岱所追和的是苏轼未和者。苏轼未和的陶诗有:《荣木并序》、《赠长沙公并序》、《酬丁柴桑》、《命子》、《归鸟》、《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》、《悲从弟仲德》、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》、《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》、《戊申岁六月中遇火》、《述酒》、《责子》、《有会而作并序》、《蜡日》、《拟挽歌辞三首》等十八首(不含《联句》),不足周作人所云二十五首之数。沪藏抄本张岱和陶诗中除《拟挽歌辞三首》外,苏轼未和者皆有和诗,并多出苏轼已和的《和七月还江陵夜行途中》一首,苏轼没有和过的“述”《读史述九章》九首。周作人看到的张岱附录于东坡《和陶集》后的和陶诗,“鹤峰草堂周氏抄本《陶庵诗集》中,……五言《和贫士》七章,《和述酒》、《和有会而作》、《和挽歌辞》三章,此本均无之,盖因东坡已和,故不重复收入欤”^②。而沪藏抄本中却有《和有会而作》及与《张岱诗文集》(即《张子诗批》)中完全不同的另一首《和述酒》。据此也可证,沪藏抄本与周作人所见抄本当非同本。

二、忠愤清奇的诗风

沪藏抄本张岱和陶诗与《张子诗批》中的和陶诗并非作于同时,据《和荣木序》“三十不遇”、《和七月还江陵夜行途中序》“癸酉(1633年)八月游兰亭步彭泽前韵”等语及和诗风格,沪藏抄本和陶诗应作于明亡之前,而《张子诗批》本和陶诗则作于明亡之后避难期间。前期题材涉及田居、颂祖、咏物、游览、记事、感怀、咏史等,后期集中在叹贫固穷上。就艺术特色而论,前期清奇超

^①王友胜《简论明代的苏诗选评》(《惠州学院学报》2002年第1期)一文注释云有明崇禎刻本,未详藏于何处。

^②周作人:《知堂书话》,第849页。

旷,后期沉郁顿挫,感慨转深。本文即以后期为中心,以前期为参照,加以论述。

张岱《张子诗钞》本和陶诗当集中作于明末避难嵊县西白山时期。清顺治三年(1646)六月,清军进攻绍兴,追捕抗清志士,支持过鲁王监国的张岱挟一子一仆,逃至离山阴城西南五十里远的越王峥佛寺避难,岂知为人认出,只好仓促转移,其《避兵越王峥留谢远明上人》记其事甚详。同年九月,避难嵊县西白山中,不久,全家老小也辗转至此。由于家口不少,身边的奴仆也逃走了,颠沛流离中有时甚至断炊。在这种生活境遇极为困窘的情况下,张岱创作了他诗作中最优秀的部分篇章,其中有《张子诗钞》和陶诗十二首:《和陶咏贫士七首(有序)》、《和述酒》、《和有会而作》、《和挽歌辞三首》,此选三首为例:

空山堆落叶,夜壑声不闻。攀条逾绝巘,人过荆溪分。行到悬崖下,伫立看飞云。生前一杯酒,未必到荒坟。中夜常堕泪,伏枕听司晨。愤惋从中出,意气不得驯。天宇尽寥阔,谁能容吾身?余生有几日,著书敢不勤?手勒大明学(胸抱万古悲),凄凉失所群。易水声变徵,断琴奏南薰。竹简书日月,石鼓发奇文。王通抱空策,默塞老河汾。灌圃南山下,愿言解世纷。得与豺虎远(所之不合宜),自来(与)鱼鸟亲。若说陶弘景,拟我非其伦。(《和述酒》)

张子自觅死,不受人鬼促。义不帝强秦,微功何足录。出走已无家,安得狸首木?行道或能悲,亲旧敢抚哭。我死备千辛,世界全不觉。千秋万岁后,岂遂无荣辱?但恨石匱书,此身修不足。(《和挽歌辞三首》之一)

西山月淡淡,剡水风萧萧。白衣冠送者,弃我于荒郊。山林甚杳冥,北邙在嵯峤。翳然茂松柏,孝子自攀条。身虽(既)死泉下,心犹念本(千岁如一)朝。目睹两京失(岁月除),中兴事(心竟)若何。匈奴尚未灭(平生不得志),魂亦不归家。凄凄蒿里曲,何如易水歌?魂兮欲何之?应来庙坞阿。(自注:庙坞,为先父母葬地。)(《和挽歌辞三首》之三)^①

张岱这类诗的情感内容和风格特点都很相似,皆纪实明志,言情抒怀,兼具《离骚》、杜甫诗歌沉郁顿挫、血泪崩落的特点,感人至深。所有的和诗渗透着一种挥之不去、浓墨重彩的深沉悲哀,如“悄然思故苑,禾黍忽生悲”(《和陶贫士七首》之一);“丹崖与白石,彼或谅吾心”(《和陶贫士七首》之三);“身不仕二姓,何如楚两龚”(《和陶贫士七首》之六)。无不明显表达了眷恋故国、义不降清的忠愤之情。《和述酒》与《和挽歌辞三首》尤其悲不自胜,“愤惋从中出”,“深情出纸上”(《画中剑客》)^②。与前期同题诗写“煎茶非孟浪,要与烟霞亲”的闲雅相比,此引《和述酒》径云:“若说陶弘景,拟我非其伦”,

①《张岱诗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24-26页。其中《和挽歌辞三首》之三据黄裳藏手稿本《柳塘文集》,括号中为刻本所改字;参《皓首学术随笔:黄裳卷》,中华书局,2006年,第89页。

②《张岱诗文集》,第31页。

可见生活感受的深沉；《和述酒》、《和挽歌辞三首》之三括号中的文字，当是清代刊刻者后来修订取用的，与原来直言不讳、充满激愤的文字相比大为逊色。正是因此忠愤，诗人才在诗歌中表示愿同陶渊明、黔娄、伯夷、叔齐等高尚、困穷的士人一样，固穷守节，“身不仕二姓”。在这些诗歌中，除了《和贫士七首》其二（风雨当重九）、其六（陶公坐高秋）等少数几首略显旷达以外，大多悲情浓郁，似与陶诗不类，但都源自现实生活的遭遇，诗情真诚。而这一真诚无伪的特点与陶诗的精神取得了深刻的一致。也就是说，张岱后期和陶诗不像前人那些不成功的和作，在字句、韵调、意趣等方面亦步亦趋，准拟陶诗原来风貌，而是情由衷出，坚定不移，在看似素朴的外表下却是矫健有力、气凝神完。与单纯的萧散飘逸和故作高雅形成鲜明对比，此种真诚坚定更契合陶诗精神的本质特点。

与后期和陶诗集中在叹贫明志相比，张岱前期和陶诗内容较丰富，涉及咏史（11首）、咏物（6首）、游览（6首）、感怀（2首）、纪事、述祖、节日（各1首）等。前后期和陶诗的相同处在于都是有感而发，善于在实录中感怀悟道。但与后期的沉挚清拔不同，前期更显空灵清奇。如《和六月遇火》叹虎丘火灾云：“顷刻灰烬尽，兴亡如等闲。”不是身陷其中的悲愤，而是旁观审视的理悟；又如《和七月还江陵夜行涂中》写兰亭风景云：“酒气通泉味，轻岚带月明。白云无意出，秋水上岸平。”灵隽清奇，闲雅萧散，后期和诗中无此类。要之，张岱前期和陶诗虽感慨不深，然风流自赏，自有倜傥超群之处。试比较前后两首《和会有会而作》：

山中无俗事，粗粝可充饥。涧下青荠嫩，坡前笋蕨肥。不藉松为饭，无劳薜作衣。兰亭去感慨，彭泽无伤悲。不求今日是，不知昔日非。孤藤悬夜壑，四大空如遗。一念既不住，万念复何归？自到移情处，咸连安足师？（沪藏抄本和陶诗）

乱来家愈乏，老至更长饥。菽麦实所羨，孰敢慕甘肥？未晓春瓶粟，将寒补衲衣。婢仆褰裳去，妻孥长作悲。彼但悲歧路，讵知世事非！近稍力耕凿，田间有秉遗。喜此偶延伫，每携明月归。但愿岁时熟，丈人是吾师。（《张子诗钞》本和陶诗）

前期作者身处富贵，憧憬淡泊，因超俗之雅趣而得身心空如之超脱；后期作者跌落穷困，感同身受，虽强作旷达，而悲不自抑。又如前期《和五月中都还规林阻风》二首之二云：“人径皆田舍，度桥始见之。四山原意外，一水更难期。吐奇阳羨口，楼阁屢吞时。适值山崖缺，亭台又在兹。石借藤萝系，花随流水辞。武陵当日路，到此更何疑。”借桃源结构写曹山景色移步换奇之美，令人应接不暇，虽无后期和陶诗的深沉，但风雅自然、清奇灵异，足以动人。

周作人云：“宗子所和诗不知视东坡何如，读去觉得却也还不恶。”^①可以

^①周作人：《知堂书话》，第849页。

说苏轼、张岱和陶诗面目各异,却都有很强的可读性和独到的文学价值。据笔者初步考察,苏轼之后到明末,创作和陶诗的作者有据可按者至少有二百多人。和陶诗创作蔚然成风,作家作品层出不穷,但真正能够与苏轼和陶诗抗衡,写出自我至情,富有鲜明特色,艺术价值可以进入文学史优秀作品行列的并不多,而张岱的和陶诗虽然仅有四十首,却可以给予这个殊荣。

三、在抑苏中扬陶

沪藏抄本《和陶集》中有一百多处张岱评陶评苏的言论,这些言论不但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《陶渊明资料汇编》、钟优民编《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》没有注意到,而且在学者的相关论述中也几乎找不到它的踪迹。张岱的评陶言论,特点鲜明,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首先是对陶诗偶有贬评。周作人论云:

宗子对于东坡殊不客气,评渊明诗固多倾倒,但也有一两处,如《答庞参军》批云,“亦是应酬语。”又《和胡西曹》批云,陶诗“亦复不佳”,语甚意直,陶诗评语中殆不多见,颇有意思。^①

又如评陶《和胡西曹示顾贼曹》“响然臻”三字云:“句亦生。”在众口一词的颂扬声中,有此率真之评,非张岱难能。

其实,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处,张岱对陶诗全是褒扬备至的赞评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张岱每每在贬抑苏轼和陶诗的情景下或明或暗褒扬陶诗。其评苏轼和诗艺术特点多为不留情面的贬抑,一方面认为苏轼和陶诗缺少韵味,效颦多于个性,俗气:如评苏轼《和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》及《和饮酒二十首》其二十“意味都尽”,评苏《和己酉岁九月九日》“意味索然”,评苏《和停云》其一“通篇意味俱短”,评《和游斜川》“押韵而已,意味亦俗”,评《和郭主簿》其二“味同嚼蜡,奈何奈何”,评《和拟古九首》之八首“徒具他人面目,不露自己精神,虽说得乱堕天花,终同嚼蜡”,评《和饮酒二十首》其一“偶得酒中趣,空杯亦常持”一句“是效颦无弦琴”,评其七“顷者大雪年,海派翻玉英”一句“五字雪诗,最恶道”,评《归去来集字十首并引》“集本字诗成句而已,无甚佳境”。另一方面,张岱讥讽苏轼和陶诗缺少淡泊从容、自然纯真的风度:如评《和刘柴桑》“万劫互起灭”一首“东坡毕竟是高华中人,凡说隐居,终带忙碌”,评《和王抚军座送客》“古来处困,独彭泽一人,东坡记榔枕,子厚赋囚山,语虽旷达,终带牢骚”,评《和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》“东坡豪气未除,何得便言稼穡,虽费揣摩,终属勉强”,评《和归园田居六首并引》其四“意、景俱忙促”,评《和陶咏贫士七首》其五“意既不纯,语复夹杂”,评《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》其五“和韵诗最忌凑砌”,评《和陶神释》“语尚粘滞”等。

批评苏轼和陶诗也就意味着对原作陶诗不动声色的褒扬。实际上,张岱的

^①周作人:《知堂书话》,第848-849页。

确把陶诗的优点摆在了苏诗的对立面。有学者指出:

关于陶诗与苏轼的和陶诗优劣之争,由来已久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张氏对此则是褒陶诗而贬苏诗,在对二人诗歌的比较分析中,对苏诗时有微辞,如评陶潜的《时运并序》其四说“意兴勃勃”,而评苏轼的《和时运》其二则说“自动斧凿”。评《答庞参军并序》其六“以保尔躬”句说“尾语情深”,而评苏轼的《和答庞参军》其一“而非玄德,三顾我庐”二句却说“俗境”。评《劝农》其六“无所不备,其言如海”,推崇之至,可以想见;而评苏轼的《和劝农》其二却说“自带烟火”,言外之意,苏轼尚未澄心静虑,归隐田园。有的时候,张氏于同一评语中直接是渊明而非东坡,如评《和读山海经》其一说“人谓东坡窥禅学之藩篱,余谓东坡得玄门之糟粕,力如缚蛋,语复骑墙,孰若渊明不言仙佛,菽粟、布素,皆证好果。”又如评《和拟古九首》其二说“元亮语短情长,子瞻词繁意简,是其二人优劣。”^①

张岱评苏轼的确有些刻薄,但也具体切实地指出苏轼和陶诗与陶诗的差距,这种差距概括起来就是陶诗语短情长、意兴勃勃,而苏诗词繁意简、兴味索然;陶诗自然传神,而苏诗雕琢拼凑。以天才如苏轼者和陶尚且难免自露己短,一方面说明陶诗作为经典的不可重复性,另一方面表明诗歌的产生有自己的内在逻辑,不是单纯的模仿所能够获得本真的。张岱其他专门赞赏陶诗的言论也多在突出陶诗意味深长之处,如评《饮酒二十首》其十七“渊明清标历历言表,以《饮酒》名篇,大有深意”,评《答庞参军》“凡说幽隐语俱着意兴,方知渊明非止山泽之臞”,评《杂诗》“欲言无予和,挥杯劝孤影”二句“渊明诗每于议论中插入模景数语,必以冷艳惊人”,评《桃花源记》语句“诗中有画”“数语括数代,又复婉尽”,评《归园田居五首》其四“死灰无复馀”“便是深惜,言及于此,三教圣人皆低头不语”,等等,此皆注意就其意趣和诗艺上的深婉意味、阅读感受上的新颖动人作出评点。

值得指出的是,张岱评苏轼和陶诗是基于自己的艺术偏嗜,并非对苏诗各方面贬斥得一无是处。一则,张岱对苏轼和陶诗有零星褒评。如评苏轼《和陶还旧居》“不敢梦故山,恐兴坟墓悲”二句“泫然此语,便胜彭泽”,评《和陶饮酒二十首》之八“煌煌凌霄花,缠绕复何为”等句“喻言最妙”,评同诗之十四“凡说子由,津津不置,古今友爱至谊,自以眉山第一”,评《和陶杂诗十一首》之二“西窗半明月,散乱梧楸影”为“好光景”。二则,张岱对苏轼爱之切,故憾之深。读张岱自己的和陶诗小引,知他和陶本来是为苏轼和陶诗“拾遗补阙”,并诙谐地说:“子瞻见之,得不掀髯一笑乎!”足见他对苏轼和陶诗是喜欢在先,只是在与陶诗的对比中,苏轼和诗方显示出雕琢乏味之弊,令他不能容忍,故往往率真指责。张岱还引述东坡评陶之语对陶表示赞赏,实际也是对苏轼评语的赞同。

^①王友胜:《简论明代的苏诗选评》,《惠州学院学报》2002年第1期。

四、强烈的心灵共鸣

张岱既然对苏轼和陶诗多有指责，深明和陶之不易，但他为什么又宁愿“重蹈覆辙”呢？

张岱前期对陶渊明的接受主要是出于风雅的仰慕，如《述史十四章》中《陶靖节》一首云：“有晋高士，柴桑陶潜。荷锄带月，植杖听泉。瓶则缺粟，琴亦无弦。诏客且去，我醉欲眠。”《和读史述九章》题作《陶潜》云：“有晋徵士，柴桑陶潜。庭栽五柳，环堵萧然。醉不在酒，琴亦无弦。北窗高卧，无怀葛天。”其仰慕之情栩然如见。就现实境遇而言，张岱前期接受陶渊明还与他三十岁尚功名无着密不可分。其前期和陶诗《和荣木序》云：“三十不遇，不得不言田舍也。”此语显然有激而发，也表明他与陶渊明放弃仕途、返朴归真的共鸣。因此，前期的和陶就不仅是要与苏轼、甚至陶渊明在艺术上一比高下，随人评说，更根本的动因在于将陶渊明纳入自己的精神世界，以加强这个世界对自我人生的支撑作用。

张岱后期继续接受陶渊明事出有因，就现实原因而言，主要是在改朝换代所造成的艰难生活面前，效仿陶渊明在现实中立身，借陶以固穷守节，坚定政治人格追求。张岱出身于诗书簪缨之家，明亡前生活豪华，曾嬉游浙、苏、鲁、皖等省，广交朋友。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清兵入杭州，鲁王监国绍兴，张岱积极投入抗清复明斗争。后迫于时世，避难嵊县西白山、山阴县州山项王里，撰述明史《石匱书》。六年九月，时局缓和，才回山阴城，租居卧龙山下快园，直至去世。张岱《和贫士七首序》云：“丙戌九月九日，避兵西白山中，风雨凄然，午炊不继，乃和靖节《贫士》诗七首，寄刻中诸弟子。”《陶庵梦忆自序》云：“陶庵国破家亡，无所归止，披发入山，鬻鬻为野人。故旧见之，如毒药猛兽，愕窒不敢与接。作自挽诗，每欲引决。因《石匱书》未成，尚视息人世。”^①明清鼎革之际，生活的窘迫、遭遇的艰难、精神上的激愤令他想起善于处穷的陶渊明。观张岱后期和陶诗，其效仿陶渊明立身苦隐躬耕，固穷守节，维持民族大义是贯穿始终的遗民情绪。张岱评苏轼《和咏荆轲》云：“二疏取其知退，三良取其殉主，荆轲取其报仇，元亮于此深情一往。”身处困境的张岱深会了渊明精神。陶渊明“不仕二姓”、君子固穷的坚毅人格和操守无疑给了张岱以生动鲜活的精神支撑。

从陶渊明接受史角度来看，张岱之所以采用和陶、效陶、用陶语陶典，与苏轼、徐渭、王思任等前辈影响分不开。自苏轼之后，陶渊明成为包括明人在内的读者最为不可忽视的士人之一。除了艺术拟仿以外，张岱在行文中还顺手引用陶渊明诗文及其典实，如《石匱书》卷二〇七下引述渊明《乞食》诗贬评屠龙晚年“以文词为乞食，其志安得不降，而文安得不卑”^②，《陶庵梦忆》卷三《丝

①《张岱诗文集》，第110页。

②张岱：《石匱书》，稿本补配清抄本。

社》用无弦琴典故云：“但识琴中，无劳弦上，元亮辈正堪佳侣”等。张岱《夜航船》卷一《天文部》、卷二《地理部》、卷三《人物部》、卷六《选举部》、卷八《文学部》、卷九《礼乐部》、卷一七四《灵部》等有十二条简述了与陶渊明相关的故实。《夜航船》本是趣味性的类书，陶渊明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关注对象，这不仅说明张岱对陶渊明的熟悉和喜爱，也表明苏轼之后陶渊明的不可忽视。张岱对本朝的前辈徐渭、王思任等十分敬重，如二十七岁辑录《徐文长佚稿》，乞求祖父张汝霖及汝霖好友王思任为之作序。明代和陶成风，徐渭曾经为酈绩溪的和陶诗作过序言，王思任嗜陶，今天仍存其《律陶》诗。再如张岱父亲张耀芳待下人宽厚，“见儿辈有怒笞臧获者，辄诵陶渊明《诫子书》‘彼亦人子，可善视之’”^①。耳濡目染，张岱自然会对陶渊明抱有好感，在和陶作诗、效陶自为墓志铭上直接受到苏轼、徐渭、王思任等人的启发。和陶，学陶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精神的传递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张岱接受陶渊明而没有淹没于陶渊明，这与末世巨变所产生的空幻感分不开，更与他受晚明解放思想思潮影响下的强烈的个性追求密不可分。其《娜嬛文集·娜嬛诗集序》赞赏：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则宁学我。”^②此语虽承晋人风度，实则为对晚明个性化思潮的认同。张岱做人如此，作文也如此。因此，张岱接受陶渊明时，对陶的坚毅品格感受深刻，对陶诗的不足也直言不讳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

①张岱：《快园道古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2页。

②张岱：《娜嬛文集》，岳麓书社，1985年，第63页。